

抓实融为一体的政治和业务建设 促进检察人员自觉能动创新履职

前沿聚焦

□ 董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编写全国检察机关“十大业务”系列教材，是最高检第一次成体系编写覆盖全部检察业务的履职教科书，这是有益尝试和创新。张军检察长高度重视教材编写工作，亲自组织推进，研究、审定、明确编写方向、体例、重点等具体要求。两年多来，在中央政法单位、各位专家学者和代表委员的支持、指导下，在全国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编写组各位同志齐心协力、精心打磨，圆满完成编撰任务。“十大业务”系列教材已经出版，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学好用活“十大业务”系列教材，真正发挥助推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还要付出更多努力。

一、学好用活“十大业务”系列教材 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自觉 法治自觉 检察自觉

教材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铸魂工程。在“十大业务”系列教材编写中，张军检察长反复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灵魂贯穿始终。可以说，“十大业务”系列教材就是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教科书，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传声筒，是回答新时代检察工作理论之问、实践之问的讲义集。推进系列教材学习、应用，必须力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检察机关教学、抓实融为一体的政治和业务建设，促进检察人员自觉、能动、创新履职。

学好用活系列教材，首要任务是教育引导检察人员更加自觉地做到一切检察工作首先“从政治上看”，把讲政治的要求融入监督办案，把坚持和捍卫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落实。系列教材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检察制度”作为首册，目的就是引导检察人员在回望历史、观照现实中，牢牢把握人民检察制度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其他12册教材坚持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融合，用丰富的案例阐明如何把讲政治、顾大局、为人民落到实处。坚持和捍卫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定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系列教材专门论述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扫黑除恶、服务经济发展、保障创新发展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检察思路举措，要认真抓好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用心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每一个“小案”，厚植党执政的政治根基。对此，《刑事检察业务总论》教材中专门强调“坚持准确适用法律与法理情融通并重”“让案件当事人和关心案件的人感受到公正、从内心认同公正”。《普通犯罪业务总论》教材特别指出“小案”内含“大政治”，要从这些教材中领悟正确理念、掌握方法指引，切实提升以监督办案守住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根基的能力和水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以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近年来，刑法、三大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未成年人保护“两法”等法律先后作了重大修订，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正式实施，这些都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用系列教材就要推动检察人员深入学习法律、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用法律，既做到依法办案，提升批捕、起诉等案件办理质量，精准开展诉讼监督；又坚持依法能动履职，推进溯源治理，抓前端、治未病，系列教材贯穿了善用精品案例引领法治理念、用好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等履职理念、要求，要通过学习实践，持续抓实抓好。

二、学好用活“十大业务”系列教材 奋力推进新时代法律监督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最高检党组部署的“质量建设年”，学好用活“十大业务”系列教材，是落实“质量建设年”的重要抓手。“学好”是基础，“用活”是根本。要结合推进“质量建设年”，让系列教材真正变成“活的指导”，发挥有效作用。

要学好用活系列教材，促“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提质增效。用系列教材不能照本宣科、按部就班，而是要以教材为基、以实践为本，结合新的形

势要求能动运用。比如，在年初全国检察长（扩大）会议上，张军检察长重点部署以“检察大数据战略”赋能高质量发展，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整体提质增效。这项工作总体处于探索阶段，系列教材中已有初步涉及。要用好系列教材，引导各级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增强大数据战略思维、大数据办案意识，协力推进“检察大数据战略”实施。

要学好用活系列教材，促进“四大检察”“十大业务”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检察工作坚持系统观念，就要强化一体履职，实现融合发展。张军检察长要求，要更加注重推进检察一体化机制建设。系列教材深化落实了这方面要求，各项业务虽单独成册，但内容关联、职责衔接。学习过程中，各业务条线检察人员都要“十大业务”系列教材一体学，既要精读本专业教材，深研本专业领域工作，也要主动学习其他业务教材，熟悉其他业务领域，深刻把握不同业务之间的共通性，善于综合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全面履行检察职责。

要学好用活系列教材，破解“四大检察”“十大业务”重点难点。编写“十大业务”系列教材过程中，张军检察长多次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常规性内容简写甚至不写，把主要内容聚焦到解决监督办案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上。这些问题不是编写人员闭门造车而来的，大都来源于司法实务需求。应当讲，系列教材就是对检察履职实践问题的“解题公式”“参考答案”。用系列教材，就要用这些从实践总结上升的理论，返回司法实践，指导解决基层一线办案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三、学好用活“十大业务”系列教材 必须持续做好学习应用 修订完善工作

“十大业务”系列教材出版发行不可能一劳永逸，推进检察队伍素质能力提升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级检察机关都要把“十大业务”系列教材的学习应用、修订完善作为事关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边学习边应用边完善，持续推动系列教材精益求精、丰富完善。

要抓好系列教材教育培训，统一的全新教材，统一的学习培训，有助于促进检察人员进一步统一



检察理念、办案标准。广大检察人员是学好用活系列教材的主体，要真正把系列教材看作“良师益友”，作为日常学习和监督办案的案头卷、工具书，遇到问题自觉学用，不断提升政治素养、专业知识、履职能力，决不能整整齐齐摆在书橱当“盆景”。要抓好系列教材修订完善。因编写周期、能力等问题，系列教材难以尽善尽美。特别是理论、实践在不断发展，教材还要持续跟进。广大检察人员既要学以致用，也要用以致学，学习中、应用中发现问题教材编写的不足乃至误差，要以“主人翁”的站位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共同当好高质量系列教材的编写者。

要抓好系列教材宣传推广。“十大业务”系列教材是面向社会的“公共产品”，既要“墙内”开花，也要“墙外”飘香。希望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系列教材当作一把“尺子”，帮助我们丈量检察工作的短板弱项，多提监督意见，督促检察机关更好地依法能动履职。希望各位政法同仁、专家学者，把系列教材当作一座“桥梁”，不断拓宽相互交流协作的广度深度，共同研究解决执法司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一体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携手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希望广大新闻宣传部门，把系列教材当作一种“媒介”，持续推出不同角度、富有深度的专题报道，讲好“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故事、检察故事。希望关注关注检察事业的各界朋友们，把系列教材作为一个“窗口”，更深入了解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组织体系、机构设置、主要职能，更加关注热点话题和影响案件背后的法治理念，与检察机关一起把法治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

（文章为作者在全国检察机关“十大业务”系列教材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法界动态

中国政法大学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校长马怀德、副校长冯世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陈定武、校长曹诗权、副校长李守德出席签约仪式，两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学院负责人一同参加签约仪式，仪式由冯世勇主持。

胡明指出，两校开展战略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基础。两校有着共同的基因，延续着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的优良传统；两校有着共同的初心，致力于服务政法工作、培养政法人才；两校有着共同的使命，坚持守护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国。这种联系为两校加大合作力度、深化务实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希望，两校通过深化合作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积极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导政法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为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曹诗权表示，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开启了两校合作的新篇章，把两校既有的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转化为实在的协同合作、共建共享。他指出，两校接下来要在紧密围绕一流学科共建、学生联合培养、教师互聘、协同创新、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按照合作协议积极落实。他希望，通过此次合作能够助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对照国家“双一流”建设标准和公安部、教育部、北京市等对学校的办学定位，实现快速发展，与中国政法大学达成彼此成就、携手共赢的局面。

西南政法大学生生态法学院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3月11日，西南政法大学生生态法学院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重庆广阳岛举行，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樊伟、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王岳为基地共同揭牌。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吴钰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敖山，党委常委、研究生院院长李燕，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徐泉以及生态法学院师生代表，双方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揭牌仪式。

樊伟表示，学校将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法学学科建设优势，在法学教育研究、法治宣传、法治保障上为广阳岛生态文明实践创新贡献力量。双方将努力把广阳岛打造为独具特色的“教学实践基地、政策创新基地、宣传展示基地”。王岳表示，要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在政治性、法治性、实践性、示范性和共享性等方面下足功夫，共同织密织紧“生态法治网”，走出一条生态司法保护的创新之路、示范之路。

范九利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党委副书记



本报讯 记者郑剑峰 3月10日，西北政法大学在长安校区图书馆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陕西省委关于学校领导任免的决定：范九利同志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杨宗科同志不再担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陈乃霞讲话，省委组织部宣教干部处和省委教育工委组织部相关同志出席会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植树造林过程中发挥劳动育人作用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万物勃发春光好，植树添绿正当时。3月11日上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教职工与多名学生代表来到绣球山，拿起铁锹，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活动现场，大家分工明确，互帮互助，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师生们用自己的劳动诠释对大自然生命的关爱，并在相互配合中享受着一片绿色的春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次植树节活动，后勤保障部绿化环卫服务中心引进了100株乌桕、300株野生映山红，为美丽的校园又添新绿。而义务植树也成为学校每年的重要活动，不仅很好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更在植树造林过程中发挥了劳动育人的重要作用，让全体师生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

传统文化有存量 变量和增量之分

前沿随笔

□ 郝铁川

从投身于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大讨论到如今，笔者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的变与不变问题。最近读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分析传统文化的一些文章，深切感到，传统文化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量，因而表现为一种类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并不绝对稳定的变量，即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自我消失。最后，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经过我们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成为一个增量。

第一，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量。例如，中国人强调整体思维，更容易看到整体、看到全局、看到一片森林、看到所有的关联性；西方人强调分析思维，容易看到一棵棵的树，看到每棵树的独特个性、与众不同的特点，甚至可以看到它的排他性。

迄今为止，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别还未改变，呈现一种文化的存量。彭教授列举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详见于彭教授在《解放日报》2022年2月18日发表的《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什么不同》一文）。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开枪射杀了5人，然后饮弹自



尽。此事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彭教授恰恰认识这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这名留学生当年谈恋爱时还追求过自己太太宿舍的一位室友。彭教授当时非常感慨地对自己的太太说，要是这两个人恋爱成功了，也许这名留学生就不会走到这一步。第二天，彭教授也向他的美国同事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没想到同事们一致认为，真为你太太的室友高兴，如果这两个人结婚了，那么被杀的很可能就是她。为什么会有一种不同看法？后来经过思索，彭教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从社会整体来看，认为环境、身边的人包括爱人和孩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可美国人则习惯从个体分析出发，认为改变不了，无论这名留学生和谁结婚，无论他有没有孩子，他都会杀人，这是他的天性决定的。后来彭教授还作了问卷调查，向中国学生和在美国学生提出了一些反事实推理的问题。比如，这名留学生要是结婚了，他杀人的概率有多大；如果他在美国，他杀人的概率会是多少；如果他有了孩子，他杀人的概率又有多大。结果彭教授发现，中国人普遍认为，如果他结了婚，他大概率不会杀人，因为太太会管着他；如果他有了孩子，他不会杀人，因为孩子会感化他。所以，中国人很擅长从环境因素中找原因，找到对问题的解释。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学生回答这类问题时，答案几乎是相同的——如果他在美国，他也会杀人；如果他有了孩子，他会杀孩子；如果他有了太太，他会杀太太。他们完全只讲个人的原因，而不会

从其他方面找原因。而且，中西方这种差异从12岁开始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12岁以下的孩子，大多是以个人归因为主，文化差异并不明显。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中西方文化差异逐渐明显。所以，彭教授认为在思维方面的文化差异，大约是十三岁形成的。

这个研究表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逻辑思维，我们通过学习可以掌握不同文化的逻辑思维方式，以便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还比如，在处理事务时，如果你认为人的行为大多是受环境影响的，那么你的人包括爱人和孩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可美国人则习惯从个体分析出发，认为改变不了，无论这名留学生和谁结婚，无论他有没有孩子，他都会杀人，这是他的天性决定的。后来彭教授还作了问卷调查，向中国学生和在美国学生提出了一些反事实推理的问题。比如，这名留学生要是结婚了，他杀人的概率有多大；如果他在美国，他杀人的概率会是多少；如果他有了孩子，他杀人的概率又有多大。结果彭教授发现，中国人普遍认为，如果他结了婚，他大概率不会杀人，因为太太会管着他；如果他有了孩子，他不会杀人，因为孩子会感化他。所以，中国人很擅长从环境因素中找原因，找到对问题的解释。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学生回答这类问题时，答案几乎是相同的——如果他在美国，他也会杀人；如果他有了孩子，他会杀孩子；如果他有了太太，他会杀太太。他们完全只讲个人的原因，而不会

去学多认为中国人擅长演绎思维，西方人擅长归纳思维，这是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但事实上，这个印象被彭教授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人同样善于归纳思维。还比如，过去总说中国人是谨小慎微的，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今日中国人亦非如此，在经济领域中，中国人非常富有冒险精神。想想看，争先恐后的股民、热热闹天的投资者，激情澎湃的创业者，各行各业大量的弄潮儿“手执红旗旗不湿”，成为中国人富有冒险精神的力证。因此，彭教授提醒人们，我们的思想不应该停留在个别案例、陈旧结论上。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过去刻板、胆小怕事的农业社会的人了。

第三，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增量。这一点，笔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法系研究（增订版）》和发表在《东方法学》2022年第一期上的《论中华法系创造性转化》中作了实证研究。例如，中国古代从“和为贵”“无法”理念出发，对社会纠纷偏重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今天则被创造性转化为人民调解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为ADR制度（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古代从“仁至义尽”理念出发，规定了斩监候、绞监候制度，今天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所以，我们必须辩证地分析传统文化，不断审视它，因为它已成为我们的基因；不迷信它，因为它可能明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消失了；要相信它，因为它绝非废物，它可以被时代注入新的元素而焕发青春。世上往往没有废物，废物很可能是被放错地方的能源。